

今日印度

印度与中国

中印文化关系千年史

师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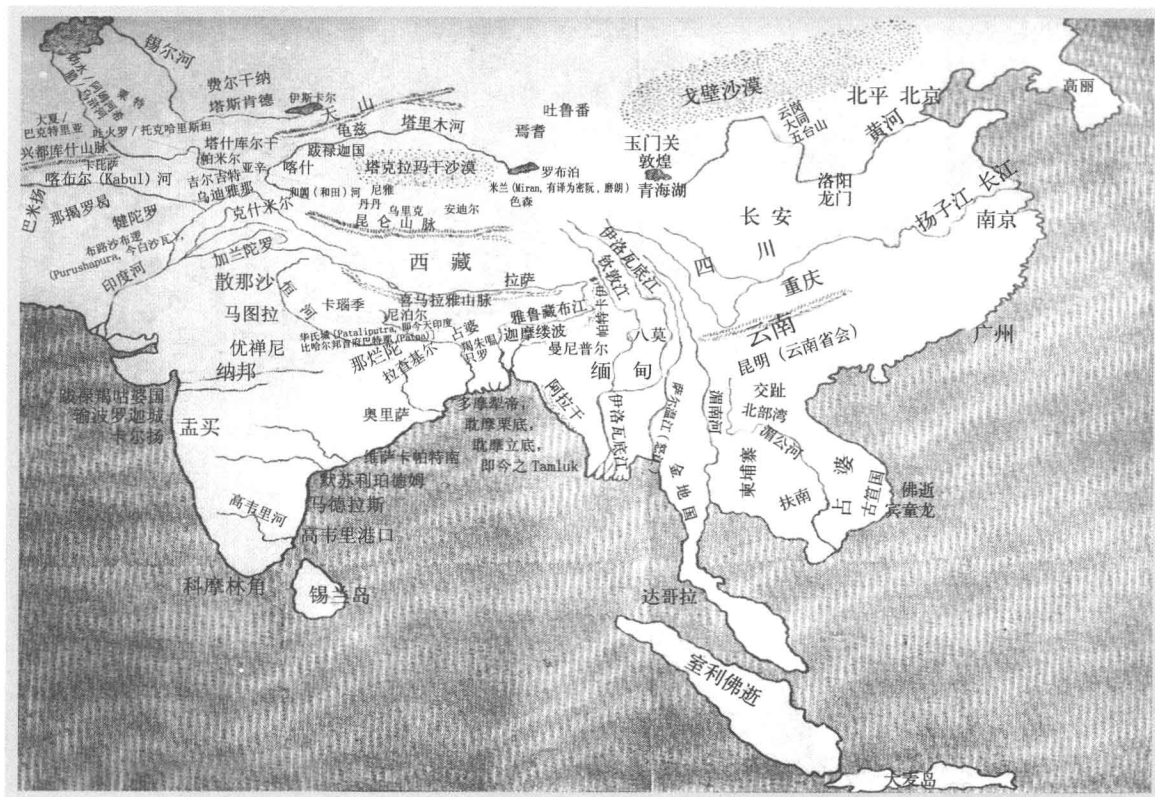


致
中国友人

“示不空心

路远莫怪其少

愿领。”



地图：印度、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

CONTENTS 目录

01 第一章 通往中国的道路及中印间的首次接触

17 第二章 到往中国的印度佛教传教士

36 第三章 古代中国人到印度的朝圣之旅

49 附录 I ——玄奘与印度友人书信摘选

51 附录 II ——菩提迦耶中文碑铭

55 第四章 佛教在中国

72 第五章 佛教著作在中国

88 第六章 印度艺术与科学在中国

104 第七章 两个文明的交往与激荡

120 第八章 中国和印度

124 附录 III 一曾在中国工作的印度学者生平简介

136 参考书目

第一章



访华文化代表团会见印度总理
印度总理：正中间，师觉月：左三，Vijaya Lakshmi Pandit：左四
拍摄于1952年

通往中国的道路及中印间的首次接触

历史背景

古代人生活的世界通常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大。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东方和西方的分野便逐渐淡化。海上、陆上交通也开始日益兴盛、固定。商业和贸易的交流为东方和西方带来了繁荣。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东方和西方文明的进步。

在这种大交流的背景下印度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并不低微。她那无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北部地区的山脉实际上并没有阻挡住外来文化渗透的脚步，同时也没影响到印度文明的对外扩张。由于很早就开发了印度洋航

线，印度的贸易商和传教士漂洋过海，畅通无阻地来到远东的邦土。印度文明如此循序渐进、不紧不慢地向亚洲大陆四面八方辐射，拉近了印度与那些在地缘上相距甚远的邦土之间的距离。因此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看，印度的历史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须臾不可分。

我们不妨回到伟大的孔雀王朝（Maurya）君主——阿育王（Asoka）的那个时代，看看印度是如何开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明进程。阿育王统治下的王国已经延伸到了印度的自然边境。阿育王是佛教的忠实信徒，而佛教的基本

教义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因此，在虔诚信仰的宗教的影响下，阿育王自然而然地要跨越那重重边境，引进不计胜数的外国人。

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是，阿育王不仅曾向周边国家，而且也向叙利亚、埃及、马其顿等王国派遣特使弘扬佛法（dharma-vijaya）。锡兰国皈依佛教据说也是他的功劳。他派出了王室中的一对王子和公主远赴锡兰来行使这神圣的使命。同样的特使也被派往尼泊尔，而且很有可能跨越重洋来到金土地（the Land of Gold），这是印度人对马来半岛和邻近岛屿的称呼。

尽管不知道这些使命是否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它们跨越印度西北部的屏障，为印度和希腊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奠下基石。阿育王王朝瓦解后，曾定居在大夏（Bactria）的希腊人开始对印度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腊人在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os）和米南德（Menander）的带领下入侵了印度。公元前2世纪他们在旁遮普（Punjab）地区建立了希腊王国。

因此，大夏国的希腊人，在阿育王王朝衰败之后不久入主印度，不仅吸纳了印度文化，而且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印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但是他们对印度文化扩张的贡献更

大。他们翻越屏障，一方面让神话般的印度智慧和繁盛惠泽中亚大地上的大夏游牧部落，另一方面也为古希腊——罗马地区带来福音。

斯基泰人（Sakas或Scythian）最先引起了印度人的兴趣。他们定居在乌浒水（Oxus）溪谷，而这条溪谷之前被希腊人占有。公元前2世纪这群族人被历史上有名的、中国人称之为月氏（Yue-Che）的游牧民族驱逐出这片区域。他们之前的定居点靠近中国边境，但是好景不长，很快他们便被蛮夷驱逐出这里。他们游移到西边，强迫斯基泰人离开乌浒水溪谷，将此地占为己有，然后继续寻找新的可以定居的土地。斯基泰人被赶到南方。那时旁遮普的北部地区为希腊人占有，因此他们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进入印度，拿下了地势较低的印度河流域，然后向印度西部扩张。他们也像希腊人一样，吸纳了印度文明，之后不久便成为印度文化的主人翁，蜚声印度海内外。

月氏人在乌浒水溪谷地区建立了强大的王国。这个族群中的一个名为“贵霜”（Kushan）的分支在公元前1世纪强大起来。很快贵霜人利用印度西北部地区希腊王国的弱点，进入该国，用了一百年建立起最伟大王朝之一，这个帝国从乌浒水溪谷地区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孟加拉地区。它囊括整个印度北部地区、

阿富汗、大夏，而且可能还包括和阗地区（Khotan）。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月氏人也很快吸收了外族文化。他们吸取了乌浒水溪谷地区的伊朗文化，而且开始对佛教信仰开始产生共鸣。他们也接触伊朗人和入侵印度的希腊人带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征服印度之后，便尽最全力保护印度文化、宗教，特别是佛教。

由此，月氏人建立的大帝国与当时亚洲大陆上盛行的四大文明息息相关，它们是中国文明、波斯文明、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这四种文明融会贯通，其广博的国际性最生动地体现在贵霜时代最伟大的国王——迦腻色迦国王（Kanishka）所采用的四个封号上，它们是天子（Devaputra）、王中王（Shaonana Shao）、凯撒（Caesar）和大君（Mahārāja），这四个封号分别是中国、波斯、罗马帝国和印度四个文明古国对帝王的尊称。自公元纪年以来，贵霜人在对外宣扬印度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还不到三百年，阿育王曾成功发起的文化全球化便达到了顶峰，尽管有政治上的冲突，但这些国家的文化还是融合得很好，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引领者便是印度。

尽管自从阿育王时代起，这些新生的政治运动就为印度和北至兴都库什山以及中亚的周边王国建立起了联系，中

国却单独出台了一个政策，正是这个政策最终导致中国国门向外族大开。公元前3世纪前期，当印度还是孔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邦国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封建领主四分五裂的状态中。虽然有中央集权存在，但名存实亡。其中一个叫做秦国的国家成功拿下了许多封建诸侯国并建立中央政府，很短的时间内便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02年）行将结束之时，一个新的王朝——汉朝执掌了政权。汉朝统治者奉行了维护新建帝国统一性的一贯政策。但不久便碰上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新问题。

这段期间，汉朝在西域的驻军被中国世世代代的敌人——匈奴族控制着。早在公元前244年，中国人通过修筑举世闻名的长城挡住了匈奴的攻击，保住了北部边境；但现在需要抵挡匈奴来自西部的进攻。为此汉朝的皇帝想到了与那些生活在边远西部的月氏人、粟特人（Sogdian）、吐火罗人（Tokharian）以及其他民族联手打击匈奴。只有这样皇上才能给意欲两面夹击的匈奴人施加压力。

于是一位叫做张骞（Chang Kien; Zhang Qian）的使节被赋予神圣使命，在公元前138年出使远至当时月氏人定居点的首府——乌浒水溪谷地区。但张骞刚刚跨过中国边境，便被匈奴人抓住并被幽禁。为了取得匈奴的信任，张骞

在那里结婚，而后在匈奴人生活的地方定居。十年与匈奴人朝夕相处，足以逃脱匈奴人的警惕，继续西行。他行至大夏。他与月氏人进行谈判，却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回复。公元前126年，张骞返回中国。

尽管这次使命没有成功，张骞的远征经历还是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效果，它第一次向中国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给皇上递交的报告中，包括了对大宛（Ferganah）、安息（Parthia）、大夏等国的详细描述。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发现：当他在大夏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西南省份的竹子和棉花在当地市场售卖。他听他说这些货物是由途径印度北部和阿富汗地区的印度商队带来的。

张骞的报告给中国的皇上留下深刻印象，让皇上意识到向西方国家和印度敞开国门的必要性。匈奴很快被驱逐出中国的西部边境，他们的领土也很快被大汉吞并。经由中亚通往西方的道路就这样被打通了。使节们开始被陆续派往这些西方国家，并且与大宛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为了防止这条商贸通道不受外敌入侵，中国皇室往中亚派遣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公元1世纪该地区许多小王国都承认了中国皇帝的领主地位。当这条途径中亚的通道的安全得以保证之后，四面八方的贸易商便向中国蜂拥而

至，传教士以及文化使节也紧随其后。这是在这段时期我们得到了第一个可以参考的历史资料，那就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传教士出现在了中国的宫廷。

中国和印度的第一次接触充满了神秘色彩。据说来自印度的佛教传教士第一次在中国的京都露面是早在公元前217年，那时还是秦朝。但是这个版本没有得到历史确认，因此权当佛教在中国确立之后所杜撰的一个虔诚传说而已。一个真假参半的历史记录中这样写道，公元前121年，一个赴匈奴国进行军事远征的中国大将军带回了一尊佛陀的金像。但是，佛教不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就来到了中国的都城。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公元前2年佛教的文字和画像第一次被月氏统治者带入中国的宫廷。而佛教传教士直到公元65年才来到中国。

佛教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故事又一次充满了神秘色彩。据说汉明帝有一次在梦中看见了一个金人。从朝臣口中得知那是佛陀后，他于公元65年派遣使节邀请佛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使节们带来了两个印度佛教僧侣，名字分别是竺法护（Dharmaraksa）和迦叶摩腾（Kāśyapa Mātanga）。两位传教士带了一匹白马，白马满载着圣文和圣物。皇上下旨为他们在都城建立第一所佛教寺庙，这便是后人皆知的白马寺（The White Horse Monastery），其名便是

为了纪念这匹白马。据说两位僧侣余生都在中国度过，他们将佛教教义翻译成中文并为芸芸众生布道讲义。许多的译本便是他们的功劳。但其中只有一篇译文流传至今。这篇译文的题目是“四十二节佛经”（The Sūtra of Forty-Two Sections），这是一本佛教的教义问答书，对佛教教义的第一批布道者具有参考价值。它包含了对佛教教义术语的解释和对入教、授圣职等的一些规定，为僧侣们的行为提供了指引。

这是中国和印度经由中亚通道开始正式交往的历史记录。而中国南方似乎已经提前和印度开始了独立交流。我们已经讨论过张骞谈及的公元前2世纪印度经由阿萨姆和滇缅公路与中国西南部进行贸易的历史资料。大量汇编了同期历史内的印度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便称中国为Cīna。这是秦朝的“秦”字的梵文音译。一个非常有名的汉学家就指出印度历史很早就可能流传到中国。这可以从公元2世纪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Huainan-tseu）中找到痕迹。《淮南子》中谈到了大禹，“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这个故事和一个佛教传说极为相似，这个传说中讲到菩萨去裸国进行贸易交流的时候也有类似“解衣而入，衣带而出”的行为。这个故事或许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也可

能是经由边境庶民传入中国。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公元1世纪中期佛教传教士在中国南方已经非常活跃。公元65年楚王英（Prince Ying of Chu）在南方接待了佛教徒。汉明帝的梦境仅仅象征了对佛教传入中国的首次正式确认。

由此，佛教把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联结在一起。印度的佛教传教士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通过文化纽带将两国人民联系起来，尽管古老的宗教信条已随着历史烟消云散，但这文化纽带依然历经岁月考验而不朽。从很早开始的贸易交往依然活跃，但是对贸易历史的了解却依旧是个谜。公元1世纪到11世纪的中印关系主要围绕着这个强大的宗教而展开，也正是这个宗教已鼓舞了全亚洲不同种族的人们有将近千年的时间。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亚洲不同种族的人们透过这个宗教，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的交流通道，尽管从本质上讲是一条贸易通道，但在我们看来，是一条弘扬佛法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各种文化从一个国家传入另一个国家。

从汉代起开放的主要陆路通道是由中亚的。这片地区有一个很恰当的名字——“中印国（Ser-India）”，因为它主要借鉴中印文化来建立自己的文明。如今，这个文明的废墟已被掩埋于荒漠沙丘之下。这里还被形容为“亚洲最深处腹地”，因为千百年来，这里从东西南北不同地区汲取文明、获取物质资源。这里也是一个中间通道，不同的文化流派经由这里贯通，继而催生新文化。

该地区北部以天山（Celestial Mountains）为界，南部和西藏之间横亘着昆仑山脉。东部的界限是从昆仑山延伸出来的南山山脉，而且这里也是中国几大河流的发源地。西部是被中国地理学家称之为“葱岭”（Onion Ranges）、古代经典文献中称之为伊摩斯（Imaos）的帕米尔高原，它将天山和兴都库什山脉连接起来。

几条流向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沙漠的重要河流从这些山脉中流出，渐渐干涸，最终消隐在茫茫荒漠中。喀什噶尔河（Kashgar Daria）起源于天山，叶尔羌河（Yarkand Daria）起源于帕米尔高原。这些河流在源头波涛汹涌，但是当它们继续向前奔涌的时候，由于临近流沙地带水汽不断蒸发的缘故，气势渐行减小。古代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曾沿着这些河流盆地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殖民地。

正是在贵霜时代佛教第一次被引入这些国家。来自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部的殖民者也一定在同时期内远征到和阗河和喀什葛尔地区并建立了小殖民地，并宣称统治殖民地的国王是印度皇室家族后裔。因此当佛教僧侣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取道中国，经过这些小国和族群的时候，自然而然受到了热情款待。大约一千年以来，对于从西方去中国或者从中国西行的贸易商和传教士来说，这条中亚通道一直是最重要的天然走廊。因此，介于中印之间的这片地带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中印国”世界。

以印度西北部为起点的这条通道沿着喀布尔河溪谷，经过醯罗城（Hidda）和贾拉拉巴德（Jelalabad），到达巴米扬（Bamiyan），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巴米扬是一个山谷，四周被兴都库什山脉的雪顶环绕，俯临连接着喀布尔地区和大夏（Balkh）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口。中国古文献中巴米扬被称作“梵衍那国”。很早这里便发展为佛教文化重镇，是远赴中亚和中国的印度行僧暂时歇脚的地方。这里也是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机关重地，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贸易商和香客。佛教有一个延续下

来的传说，那就是当佛陀的诞生地——迦毗罗卫（Kapilavastu）被毗邻的拘萨罗国（Kosala）的国王毁灭的时候，释迦家族的四个皇子被迫离开故土去抗击进攻者。巴米扬的人民接纳了其中的一位皇子，封他为国王，而且在七世纪中期玄奘还自称看见了释迦家族的后裔坐在巴米扬的王位上。这个故事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纪年初期，巴米扬一跃而成为佛教中心。它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公元8世纪。

巴米扬周围山区的许多洞穴都被改造成了阿旃陀式的佛教寺庙，为那些靠学习和冥想度日的僧侣们提供了幽静的避所。人们在山体的一侧刻出了佛陀的巨像，让过路人无不油然而生起虔诚景仰的心态。这些洞穴中发现的佛教教义手文稿是用贵霜时代和笈多王朝的文字誊写的。

越过这片山岭更靠近北部地区的路线可以将旅行者带至大夏（即现在的巴尔鲁克地区），古代中国人称之为“缚喝”（Fo-ho），印度人称之为Bālhika。虽然大夏的老百姓是伊朗人，大夏当地文化从很早便浸淫在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中，代代相传。佛教是在公元前1世纪

或更早被传入那里。大夏国的君主几次易位，从希腊人到斯基泰人，从斯基泰人又到月氏人，又从月氏人到白匈奴。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人们还是对佛教忠心耿耿。公元7世纪玄奘这样说道，巴尔鲁克的佛教大寺庙——九分伽蓝（Navasanghārāma）是兴都库什北部唯一的寺庙，那里的住持由教会的释经员连续接任。公元7世纪末寺庙被穆斯林入侵者损毁，寺庙的住持们¹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被带到哈利发（Caliph）的教廷。阿尔白鲁尼告诉我们正是这些住持在巴格达发起了学习印度天文学和数学的热潮。

大夏是通往中亚和中国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的交汇点。一条通向北方，穿越古代的粟特地区，然后穿过药杀水（Jaxartes），途经塔什干（Tashkent），向西穿越天山关口，最后到达乌什（Uch-Turfan）。另外一条道路较短，去中国的印度传教士也经常取道此路，它途经临近巴达赫尚、被中国人称之为吐火罗的邦国，越过帕米尔高原的险阻关口，然后到达喀什葛尔的平原。另一条较短的线路将喀什葛尔与印度河的上游溪谷连接起来。它穿过吉尔吉特（Gilgit）和亚新（Yasin）山谷，上行至塔什库

¹ 曾显赫一时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e）的巴尔鲁克家族（Barmak）在阿拉伯文记述中被描绘成纳福僧伽蓝（Nawbahar）火寺庙的后代住持。

尔干，在那里与另外一条路线汇合继续向喀什葛尔前行。

喀什葛尔因此便成为中国之行中的重要一站。古代中国地理学家称这个地方为疏勒，后来又称之为喀什。翻山越岭，攀岩绝壁，艰难险阻，常常令传教的行僧们灰心丧气。漫漫长路的舟车劳顿之后，突然感受到喀什寺庙的热情洋溢，真是让人如释重负、舒适备至。公元7世纪中期，喀什和叶尔羌的佛教寺庙数以百计。

再次从喀什葛尔出发，有两条道通往中国的边境。一条是塔里木（Tarim）盆地的南部边缘地带，另一条是北部的边缘地带。许多沿南部路线的小邦国兴盛发展起来。喀什葛尔、叶尔羌、吐火罗、尼雅（Niya）和其他已被历史湮灭的小宗主国，它们临近丹丹乌里克（Dandan Uilik）、安德悦（Endere）和米兰（Miran）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地区主要形成了一个伊朗区域，但他们很早便受到了佛教的深厚影响。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该地区一些早期印度殖民地存在的证据。

南部线路的这些古代王国中，和阗是古代文献中最赫赫有名的。中国古代作者称此国为于田。佛教传说让我们相信，在阿育王时代，和阗是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印度人占有的殖民地。阿育王的

一个名叫鸠那罗（Kunala）的儿子就是塔西拉（Taxila）的一个总督。因为他是长子，必然要继承王位。他的后母自然不愿看到这一切，于是布置阴谋刺瞎了王子的眼睛。鸠那罗的廷臣和随从对皇后惨无人道的恶行倍感愤怒，与失明的王子一同离开这个国家，来到和阗建立了新的王国，并封他为国王。我们知道在贵霜时代印度西北部地区和和阗关系密切。和阗地区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表明了早期这里存在着一个印度人统治的王朝。该地区还发现了用印度方言书写的国家文件。

对于佛教领域，古代和阗也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阗第一个佛教寺庙是瞿摩帝僧伽蓝（Gomatī-vihāra）。它是中亚地区研习佛教的最大寺院之一。有一段时间，中国的香客半路就停在和阗特地研习佛教，而没有再去印度。这是因为在和阗就能得到定居在那里的印度学者的指点。也就是那时起，和阗不再紧紧满足于单纯传播佛教知识，而且开始尽力促进佛教的发展。许多权威的教义就是由瞿摩帝僧寺院中的老师编写的。

沿着北部路线从喀什到中国边境的邦国在中印国的历史中也非常重要。他们在向中亚和中国传播印度文化方面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靠近乌什的巴鲁卡（Bharuka）、龟兹（Kucī，今新疆库车县）、阿耆尼（Agni，今新疆天

山南路东北部之喀喇沙尔)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都对印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用。

北路邦国的民族和语言与南路邦国截然不同,但这一次又是佛教文明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龟兹是北路邦国中最为重要的邦国,在宣扬佛教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与和阗旗鼓相当。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关注着这个邦国,充分认识到了该国在中亚政治文化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中国与龟兹纷争不断,最终臣服了这个邦国,但是该国反应迅速,极早抓住有利时机,重新获得独立。

旧时龟兹的统治者都采用诸如苏伐勃驶(Suvarnapuspa)、哈拉叠(Haradeva)、苏伐叠(Suvarnadeva)的印度名字。龟兹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但是这门语言却因为佛教而受到梵文的影响。中国来此国拜访的香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龟兹的佛教僧侣通晓梵文而且可以说梵文。在龟兹发现的一些残存的梵文手写稿片段和龟兹语——梵文双语文件再次印证了同样的说法。龟兹和毗邻邦国使用的文字和和阗使用的文字一样,都是印度文字的一种变体。

龟兹不仅是研习佛学的圣地,同样也是传播佛教的中心。公元3世纪、4世纪、5世纪该国去中国的佛教老师在传播佛教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龟兹邻国的山中洞穴是那些倾其一生致力于潜心修

学和冥想的佛教僧侣们修身养性的静地。这些洞穴的作用与阿旃陀和巴米扬的洞穴的作用是一样的。

北路的下一站是阿耆尼(今喀喇沙尔)。在文化、种族和语言上,古时的喀喇沙尔与龟兹密不可分。和这个邻邦一样,它狂热地信仰着佛教。该地区发现的残留的文学艺术作品清楚地表明喀喇沙尔在向中国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位于北路的吐鲁番偏向东部的地方与中国的联系交流甚为密切,是跨进天朝的必经之路。来自中亚不同地区的文明融汇于此,至今仍有残存,当然它在向中国传播佛教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能与龟兹和喀喇沙尔同日而语。

从塔里木沙漠北部和南部延伸出来的两条路线在中国一个叫做玉门关(Jade Gate)的边境城市汇合。离这不远一个叫做敦煌的地方曾经是研习佛教文化的最大的机构之一。公元5世纪和8世纪敦煌附近的山上建造了许多石窟供去中国的佛教僧侣们使用。中国人称这些石窟为“千佛洞”(the 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这些石洞是从西部不同国家来的佛教学者们汇合的地方,正缘于此,这些学者们很快便建立了一个知名的佛教机构。从波斯、大夏、印度、粟特、和阗、龟兹和其他国家来的佛教僧侣们满载着手抄的经文在这里集合,然

后向天朝首府继续进发。他们举办宗教研讨会，甚至在将神圣的经文传播到中国的佛教机构之前已经把这些经文译成了中文。

敦煌在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历史上扮演了伟大的角色。坐落在通往西方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从公元纪年1世纪起这里就成为中国人与外国人汇合之地。早在2世纪中期，佛教香客就在通往天府的路上发现了这个庇护所。在公元3世纪我们就听说有印度家庭在那里定居。

千佛像的石窟是从公元5世纪被挖出来的。这些石窟虽然已被历史湮灭，但还是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静如处子地守护着这个伟大的古代图书馆。考古学家已发现的石窟里包含的大量手写稿表明敦煌也发展为研习佛教的活跃中心。这些手写稿的文字和语言充满多样性，有中文、梵文、藏文、古叙利亚语、和阗语等等，这证明了敦煌是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集大成之地。

陆路通道——西藏和中国西南部

古代从印度去中国还有另外两条陆路通道。因为相比中亚路线来说，这两条通道的难度较大，而且要途径未开化的落后国家以及大片荒蛮地，因此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其中一条通道经过阿萨姆、缅甸北部和云南，另一条经过尼泊尔和西藏。这两条通道充满艰难险阻，常常让旅人气馁。途经的这些国家卫生状况不尽理想、缺乏食物和水源，而且这些国家住着野蛮人，无视宗教和文化，安全隐患重重，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取道于此的难度。

我们已经从张骞的报告中了解到，早在公元前2世纪印度商队就经由印度北部甚至远至大夏来运输中国西南部的

货物。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一些权威知名作家曾写道，公元1世纪中国商人取道印度东部直达恒河进行海上出口。也有可能在公元纪年早期时候，佛教僧侣们带着佛教取道阿萨姆——缅甸路线来到中国。

去中国的阿萨姆——缅甸路线从印度古代首府巴特那（Patna）出发，经过帕戈尔布尔（Bhagalpur）、拉杰玛哈（Rajmahal）和北孟加拉（North Bengal），然后北上行至阿萨姆的高哈蒂（Gauhati）。从阿萨姆开始，去缅甸的路线和现在一样，共有三条：一条经过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北上帕特卡伊（Patkoi）山脉然后由此向缅甸北

部进发；第二条经过曼尼普尔(Manipur)北上钦敦江(Chindwin)山谷；第三条经过阿拉干(Arakan)北上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山谷。所有这些道路在靠近缅甸边境城市八莫(Bhamo)的地方汇合，然后翻山越岭，跨越溪谷到达中国南部省份的主要城市云南府，即昆明。

虽然玄奘并不了解这条道路，他还是仔细地将他所知道的有关印度东部的信息记录了下来。他写道，“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界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玄奘从迦摩缕波人们那里得知，四川的西南边境要走两个月的行程，“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氲。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当迦摩缕波的国王婆塞羯罗伐摩会见玄奘的时候，他问了玄奘一首当时在阿萨姆非常流行的中国歌：

“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迦摩缕波的国王婆塞羯罗伐摩向玄奘讲述道，他听说摩诃至那国的秦王让国家政局混乱，破坏繁荣，影响所至，权利遍及边远地区。这位国王继续说道，“闻之久矣。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这里提到的歌曲是秦王破阵的乐曲，秦王就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的封号，他在公元619年平息了叛乱。这个叙述表明公元619年后编写的一部中国曲子传至印度东部，当玄奘在公元638年拜访该国的时候，这首歌

已经非常流行。这件事还表明，不管交流的渠道多么困难，印度东部和中国西南部在当时的关系已经是非常密切。

取道西藏的这条路线是在公元7世纪后半叶被开发出来的，当时统一西藏各部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皈依佛教，通过与中国和尼泊尔联姻的方式与两国缔盟。从这时起，印度和中国的传教士开始大量输入西藏。渐渐地，他们对西藏佛教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事实上，多个世纪以来，佛教文明是吐蕃地区唯一的文明形态。西藏还非常友好地帮助从印度去中国的佛教传教士以及从中国去印度的香客。实际上，整个公元7世纪后半叶，许多中国僧侣通过西藏去印度。

关于西藏路线的详细描述没能流传到今天。公元627年一个叫玄超(Hiuan-chao)的中国香客取道此路线来到印度，他的游记中就留下一份简短的记述。在离开中国边境的时候他跨越沙漠，穿过铁门(Darbend)，穿越吐火罗，经过蛮夷胡人的国家最后来到吐蕃(西藏)。在这里他见到了文成公主，在她的指示下，安全穿过了吐蕃并北上旁遮普的加兰陀罗(Jālandhara)。无疑这不是一条常规路线。玄超一定远行至巴达克山(Badakshan)地区，然后向东重履覆辙来到喀什和和阗。他从西南部进入吐蕃。从吐蕃首府出发，他并没有循迹常规路线通过尼泊尔到达印度，但中间跨

越平原，然后通过距离西姆拉（Simla）不远的什布奇山口（Shipki Pass）进入印度。由于公元8世纪、9世纪唐朝和吐蕃政治关系剑拔弩张，中国香客没再取道这条西藏路线。公元10世纪末一个叫吉野（Kiye）的中国香客在从印度返回中国的时候采用了此路线。他穿过尼泊尔，经过一个他自己称为“莫育力”

（Mo-yu-li，可能是吐蕃的玛玉拉托）的地方，拜访了拉萨的桑耶寺（Samye）。通过蒙古人唐朝和吐蕃重新恢复建交，同时这段时期带有印度文化的喇嘛教被带入中国。也正是这段时间里，曾受训于印度老师的吐蕃佛学家开始在佛学界崭露头角。

海路——印度支那路线和印度尼西亚

当印度贸易商带领着商队翻山越岭、穿过大漠向中亚和中国进发的时候，当佛教传教士因循他们的脚步步履维艰地教导新的民族和国家皈依佛教的时候，印度的航海家也在探索一条通往远东国家的海路。生活在印度海岸的水手渔民从史前时代就熟稔原始的航海方式。随着印度的“雅利安化”进程，航海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印度的商人和政治探险家在公元前数世纪之前就学会利用这种海路优势。阿育王派遣佛教传教士去素万纳普（Suvarnabhūmi）的故事看起来也并不像是虚构的。

素万纳普或“金土地”，顾名思义，对印度水手来说有点“黄金城”（El Dorado）的感觉。这是一个泛称，泛指孟加拉湾远东处的独岛和半岛区域。希腊作家，比如《爱利托利亚海周航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的作者，以及亚历山大大帝时著名地理学家托勒玫（Ptolemy）都知道克律塞（Chryse）岛和克律塞半岛。公元1、2世纪时他们也知道能够通过沿海岸线航行到达那里，而且那里离中国的土地已经不远。说到中国，托勒玫提起了重要的喀第喀拉港（Kattigara），这个港口的正确名字至今仍未得到确实，这个港口位于金暹罗沿岸，是去中国的水手们的目的港。

诸如印度支那，然后是印度、南洋群岛、印度尼西亚等等这样的名字被运用于远东地区的各个部分，它们的重要性和中印国一样重要。该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印度大陆的延伸，事实上，托勒玫把这个地方囊括在了他称之为“跨恒河印度”的区域。雅利安文化被慢慢地

从印度北部带到这个地区，就像雅利安文化缓缓传入印度其他地区一样，浑然天成。因此印度支那从古代起便是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中间的过渡区域，而且随着雅利安文化慢慢地从印度来到这里的同 时，中国文化也从印度北部侵染而来。

公元纪年头几个世纪，印度殖民者在远东建立了许多王国。其中最主要的王国是扶南、昌巴（Champā）和室利佛逝国（Śrīvijaya）。扶南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名字。该国的原名已不可考证。它包括柬埔寨和暹罗的部分区域。该国的建立要追溯到公元1世纪。中国历史学家记录了它第一次被印度人占为殖民地的历史传说。这个传说这样写道，

“扶南的开国者是一位叫做叶柳（Ye-liu）的女人。有一个叫做混填（Kaundinya）的外国人施了迷信膜拜仪式。在梦里梦见神赐弓箭一把，让他乘商船入海。他在神庙下发现这把弓箭，然后决定乘着商船漂洋过海。他来到扶南国，被众人抓住，然后与女王叶柳成婚。扶南的早期统治者就是这位印度人的后裔。”

公元6世纪以扶南为中心，来自印度的第一批移民建立了强大的柬埔寨王国（Kambuja）。柬埔寨王国在鼎盛期的时候，包括了现代的柬埔寨、暹罗和毗邻邦国的部分区域。在远东政治文化历史上它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公元12世纪。婆罗门教是

该国的法定宗教。佛教也在后来被引入进来。印度字母便影响了柬埔寨语。这里梵文水平也很高。梵文的墓碑题铭表明该国的梵文达到了精雕细琢的高度。从公元3世纪开始，柬埔寨王国宫廷便经常与中国保持交流。公元6世纪许多该国佛教传教士被派往中国。因此很明显，柬埔寨在中印外交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公元2世纪，印度的殖民者就来到了安南（Annam）海岸，他们或是经由柬埔寨或是直接从海路来到这里。在安南建立的第一个王国便是昌巴。和柬埔寨的殖民者不一样，昌巴的人们更多依靠海路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安南海岸线的港口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海上航行。昌巴因此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度海路的重要一站。

在昌巴最繁盛的时期，国界的北部界限触及到了中国天朝，那时东京（Tonkin）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昌巴因此与中国有了陆路海路两种直接交通方式。该国的印度殖民者带来了印度教和梵文文化。近十个世纪以来，昌巴王国一成不变地保持着印度传统。梵文被采纳为文化语言，所有的碑铭都用梵文刻写。印度教是该国国王和人民的法定宗教。沿安南海岸的岩石峭壁上建造了无数庙宇，它们俯瞰大海，也是印度教长久以来受惠于繁荣盛世的最好见证人。